

人性、剥削与革命意识^{*}

——论马克思道德学说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

□ 顾青青 余龙进

内容提要 艾伦、布坎南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考察共产主义的基点是利益导向的优先性和结果导向的利益最大化,其核心概念和论证方式都属于古典功利主义的叙事框架,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事实上,马克思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出发来考察利益与道德,从人性、剥削与革命意识三个维度实现了对古典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批判与超越。具体来讲,马克思以“具体人性观”取代“抽象人性观”,确立了利益的客观物质性基础,为道德的产生与发展奠定科学基础;以“共同占有”取代“剥削关系”,实现了私人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既捍卫个体权利又保障共同体的善;以“革命运动”取代“改良主义”,强调客观规律与革命意识的辩证统一才是利益的实现方式,也即只有通过制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道德。通过这三个维度,马克思实现了对古典功利主义道德观的倒转和重构,并同时确立了其自身道德学说的历史性、社会性与革命性的辩证批判性特质。

关键词 马克思 功利主义 人性 剥削 革命意识

作者顾青青,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余龙进,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311121)

DOI:10.14167/j.zjss.2021.03.0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将马克思的道德学说归类为功利主义,认为马克思开展道德评价的依据是需要、欲求或偏好等利益的最大化满足,其核心概念和论证方式都属于古典功利主义的叙事框架。其中,英美分析学派的艾伦和布坎南是典型代表。艾伦认为,马克思将一切利益,无论是谁的利益,都看做是值得满足的最基本的利益,甚至是马克思之所以支持自由贸易和殖民主义,是因为它能加速社会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

多满足人的需要与偏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①布坎南也基本持相同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受到谴责,并不是它不正义或不道德,或因为它不符合人性;而是因为它不能完成所有人类社会都有的基本任务:它不能满足需要……对于基本及非基本的需要或对于需要和欲求的满足的成功程度,是马克思的终极评价标尺。”^②可见,在艾伦和布坎南看来,利益导向的优先性和结果导向的利益最大化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考察共产主义的基点,遵循的是功利主义的思路。

艾伦和布坎南的分析有一定的文本依据。马克思确实将利益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

^{*} 基金项目:2019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道德理论辨析及其当代观照研究”(19NDQN308YB);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17ZDA022)。

尤其是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时,马克思开始对林木盗窃法以及摩塞尔河地区农民贫困状况展开思考,发现理性国家并不在意人民群众的贫苦,而实质上维护的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这就进一步促使马克思重新检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经过对大量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之后,马克思逐渐厘清了上述两者的关系,对现实的物质利益考察逐渐代替理性国家观成为马克思社会分析的首要原则。“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③，“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础”^④，“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所造就的是一种社会对抗,奴役和不平等是社会对抗的结果,它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痛苦,而无产阶级社会将更为有效地消除痛苦,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争取最大限度的福利。本文认为,虽然马克思把他的理论构筑在对人类潜在利益论述的基础上,艾伦和布坎南等学者也确实在此意义上来判定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是功利主义式的,但马克思对利益范畴的具体阐释与功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包括利益的人性基础、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利益的实现方式等问题。换言之,艾伦和布坎南仅看到了马克思文本中利益这一概念与功利主义的术语在字面上的重叠,而未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出发来深刻解析利益,这显然是背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本文以利益范畴为中心,从人性、剥削与革命意识三个维度呈现马克思道德学说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并以此回应艾伦和布坎南等学者对马克思道德学说的功利主义归类。

二、利益的客观物质性基础： 以“具体人性观”取代“抽象人性观”

在古典功利主义看来,人们对幸福、快乐或偏好等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有着深刻的自然主义基础,是人类有机体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框架的自然构造”决定着人们始终遵循趋乐避苦,追求幸福的功利原则,也即只要他是一个自然人,他就要不断追求幸福,人们行为的必然性就是基于这一生理来源和人类本性。“自然把人类置于两

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⑥在功利主义的视野下,人性因受其生理因素的制约而表现为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的利益集合体,这在批判宗教禁欲主义人性观,肯定人的世俗欲望,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功利主义同时把自然人当作标准的人、理性的人和固定的人,把人的本性物化为趋乐避苦的生理性,并把它当作单一不变的、衡量万物的唯一标尺。这一标尺抹去一切具体的社会情境,就像数学公理一样具有普遍适用性,这就使得功利主义的人性观带有明显的抽象性和先验论特质。

可以说,马克思关于利益的论述也同样建构在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特性的人类本性中,但在马克思看来,可以用来区分人和动物的并不是超自然的宗教意识或精神力量,也不是人类趋乐避苦的生理本性,而是自由的实践活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⑦这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首先表现为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开展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⑧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活动作为人性的存在方式,强调人性是在与社会现实生活 and 具体历史进程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展开和实现。与功利主义人性观的抽象性相反,马克思对人性的考察是历史的、社会的。人类需求与人类能力是具体的、历史的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创造出新的需要和享受,新的社会实践需求产生新的人性内容,“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⑨人的需要的全面展开和丰富性拓展就是人性不断实现和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过程,是人性不断克服现实性制约,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同时,马克思在考察人的物质需求时是按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方式,是按人与外部对象性世界的关系的方式来展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

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⑩这意味着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的需要和享受不仅以自然物品为尺度,更是以社会关系为尺度。

对于马克思人性观的上述特质,佩弗的论述是十分到位的,“在马克思的人性概念里,人的两种本质的能力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类共同体,而且,马克思对于人性的说明不仅仅是纯描述性的,而且还是评价性的。”^⑪这一评价性就体现在马克思对功利主义人性观的抽象性和利己主义性质的深刻批判中。在马克思看来,功利主义之所以将趋乐避苦的人性抽象化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即这种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具有一定特性的社会活动和具有丰富社会意蕴的社会关系都归结为功利关系,这些活动和关系并不是作为活动本身和关系本身而具有意义,而是只有把其归结到唯一的功利关系或剥削关系中时才有意义。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功利关系或剥削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⑫,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的金钱盘剥关系所代表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性质。所以说,功利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代表,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现状展开辩护,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以谋取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在这些情况下,它下降为道德说教,下降为对现存社会的诡辩的粉饰”^⑬,功利主义也由此从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而走向了保守。虽然功利主义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切现存的经济关系相比于封建剥削关系而言是清醒的,务实的,并对封建的宗教神学关系展开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但这一斗争与批判也是有限度的,它所能批判的仅仅是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关系,而将现存的资产阶级关系美化为为所有人谋利益,对所有人都最有益的经济关系。

很显然,艾伦和布坎南都误解了马克思,基于马克思对利益的考虑和对效能原则的支持就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判定为功利主义的做法是草率的。功利主义对利益的阐释基于抽象人性论,它抽离具体现实的社会关系,将人性简化为一般的标准形式,以此来囊括和涵盖所有的社会情况,但这

种普遍主义的做法更显空洞和乏力,由于远离现实而缺少对现实的解释力。马克思坚决反对功利主义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对利益的空泛理解,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由的实践活动是人性的基础,没有全人类共同普遍的人性,只有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中,代表不同阶级关系的人性。所以,马克思与功利主义在价值立场和阶级立场上是根本对立的,功利主义人性的利己主义性质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马克思代表的是人类共同体的价值,维护的是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利益。

三、私人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 以“共同占有”取代“剥削关系”

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追求在最终结果上社会净效用的最大化,但功利主义并不关心具体谁获得了利益,而只关心那些能给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带来更多效力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在密尔看来,那些受过教育的、具有更高教养的资产阶级的需求和欲望相比于无产阶级而言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视,因为他们对整体利益的贡献率更高。所以一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效用计算就是唯一的判断标准,舍弃对整体利益贡献率更低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合理且正当的,这就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提供了合理性论证与合法性辩护。马克思对功利主义的这一剥削本质有过深刻的揭示,“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剥削人)……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⑭但事实上,“功利主义者却拒不接受这个断言:剥夺他人‘正当’权利的偏好是不正当的。在效用主体看来,不可能先于效用计算去建立正当权利的标准。……只有使效用最大化的分配形式才能够确定什么是我的正当所有,因此根据定义,使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就根本不可能剥夺我的权利份额。”^⑮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看来,只要能使社会的净效用最大化,将他人作为手段和工具,牺牲他人利益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并不存在剥削关系。就算当边沁思考社会产品由富到贫的再分配时,也只是出于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所造成社会动荡是否会降低社会净效用的担忧,事

实上是为改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所做的策略性选择,具有一定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其目的是释放意识形态的烟雾进一步巩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

艾伦看到了马克思视野下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对立,但他试图通过将无产阶级利益分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方式来遮蔽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对抗,认为以牺牲工人阶级的短期利益来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事实上是符合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应该被满足,不是简单因为它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它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建立的必要条件。这是资产阶级从长期看所带来的社会积极效用,比工人阶级短期的负效用更重要。”^⑩艾伦正是以此种功利主义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方式强调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促成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美化恰恰是遮蔽了资本主义作为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更是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激进品格。马克思虽然没有对剥削这一概念做过明确的定义,但马克思是坚决反对剥削的,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所强调的要消灭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这一论述中,“以前的一切革命都是用一种剥削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与此相反,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⑪,而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制度最完备的表现形式就是资产阶级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剥削一方面违背了个体所内在持有的个人对对象性成果积极占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它把人当作工具和手段,是对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能力的破坏。为此,艾伦基于剥削符合工人阶级长期利益的这一论点而将马克思归类为功利主义者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

具体来讲,虽然马克思对权利的态度总体上是淡漠的,甚至不屑于谈论个人权利,认为任何一种人权都是市民社会中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脱离共同体的人的权利。但马克思“仍然是一位具有强烈个人权力认同的理论家”^⑫。马克思所反对的并不是基于个人劳动而获得财产的权利,“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⑬,马克思所真正反对的是利用这种占有去支配和奴役他人的劳动的权力,反对的

是代表资产阶级私人利益的私法。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⑭,并认为“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也是资本家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⑮,盗窃、窃取等词的使用正是表明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无偿占有,在这种以占有为本质特征的剥削制度下,工人是为资本而活,是为剩余价值的增值而活,而不是为占有和丰富自己的生命本质而活。所以说,虽然资本主义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社会总福利也实现了大幅度提升,但这种以剥夺工人阶级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的方式所实现的社会福利是没有普遍性意义的,对工人阶级而言仍然是普遍的赤贫。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恢复劳动者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积极占有。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剥削把人当作工具和手段,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能力的限制。在剥削制度下,每个人都只顾自己,每个人不是把他人作为自己利益的实现,而是作为自己实现利益的限制,他人只有作为实现自己私人利益的手段时才具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每个人“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⑯,只要满足私人利益就能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实上,“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⑰这一假象所要掩盖的是市民社会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相互对抗和相互分离的趋势,资本家通过资本占有劳动的方式以实现资本增值,而工人作为劳动客体是被资本剥削和奴役的对象。所以处于这种对抗性关系之中的个人不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是孤立性的、敌对性的和抽象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巩固了个人所隶属的阶级之间的对抗,实质上就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个人应该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个体之间的利益不是敌对的和冲突的,只有个别私人利益合于人类利益,只有将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视为人类解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即只有消灭剥削关系,恢复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才

能真正实现私人利益,才能真正实现私人利益和整个人类利益的统一。这是我们正确理解的利益,也是我们正确理解道德的基础和前提。

四、基于革命意识的利益实现方式: 以“革命运动”取代“改良主义”

功利主义关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原则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上的机械决定论,我们的行为完全被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这一普遍有效的心理学原则所推动,这是一种独立于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实践行动的自然必然性,也是一种关于自动而普遍的直线形历史进程的客观演绎。可以说,功利主义的理论图景是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紧张关系的积极解决,但囿于其机械决定论的立场,这一尝试并没有获得成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概念能用来护卫任何家长式统治的或极权主义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幸福是以牺牲个人决定自我选择的自由换来的。因而在某些情况下,幸福与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价值。”^②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则是用来护卫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物质关系,表明既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能够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那么实现这一福利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就是天然合理的,任何人都不能基于自身的意志对其展开价值评判或是妄图改变它。可以说,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工人阶级若是认同了上述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机械式解读,那他们只会把自身被压迫和奴役的现实当作是一种客观必然的关系,自身也仅仅是这种历史关系的被动承载者,自身意志作为外部客观环境的对象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影响历史的发展。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功利主义这一理论立场实际上是一种超越阶级的道德宣传,具有意识形态的迷惑性,这种“自然化了的客观主义学说,严重窒息了理论的价值批评立场,实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层面的反映。”^③在这种具有高度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达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被削弱了,甚至是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使其走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

而在马克思看来,推动历史进程的因素并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某种基于趋乐避苦生理本性的

客观必然性,是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和自由意志共同塑造了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虽然首要满足于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必然性,但我们并不能夸大它的有效尺度以及其发挥作用的边界范围,因为实践主体对自身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知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④,任何否定人的意识、精神和思想的能动性作用的做法都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为此,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若是遵循功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实践诉求,屏蔽其自身的自由意志而仅靠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想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和最大化利益就是一种空谈和妄想。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要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全面认识与深刻把握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位于的阶级地位以及肩负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一种确切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才能成为革命局势中的主要成分,才能进行彻底的革命实践。同时,具有充分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不仅明确自身所处的地位和使命,更是明白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的普遍性作为针对外部客观世界所具有的实践力量,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战略口号,标志着无产阶级对全世界无产者共同利益的清醒认知,也标志着无产阶级由分散走向联合、由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作为实践主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实现阶级利益过程中的重要性,但革命意识的产生也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事实和基本生产关系的科学分析,革命意识所造就的历史可能性必须要建立在客观的历史规律运行的基础之上,这就为革命意识的作用发挥限定了适用范围。“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⑤任何期望废除剥削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的社会行为都要以当前社会现存的生产力为前提条件。总而言之,与功利主义者立足于具体的个体领域,以追求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达到个人快乐的实施路径不同,

马克思立足于宏观的社会历史领域,以历史规律和革命意识的良性互动来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历史规律和革命意识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要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本,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以哲学为锐利的批判武器,以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为实施路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②,“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③这正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若要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条件是根本,但同时无产阶级本身及其革命意识作为重要的偶然性因素,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获取自身阶级利益过程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此,虽然艾伦和布坎南看到了马克思对阶级利益的眷注,也看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在实现利益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但由此把马克思归类为功利主义者,则是抹杀了两者在获取利益的途径与实现利益的方式上的根本性差异。这一根本性差异源于双方阶级立场的不同,艾伦和布坎南囿于其资产阶级的立场,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恒性而掩盖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主体能动性作用,实质上是一种高度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达,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本质,更是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因为马克思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他代表的是整个人类的整体利益,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④,如果不同时打破身上的枷锁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历史的、暂时的,就没有办法真正地、彻底地解放自身。

以上诸种分析可以证明,马克思的道德学说在人性、剥削与革命意识三个维度上构成了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是事实性批判与规范性批判的统一,是对功利主义关于利益的人性基础、利益的生产与分配、利益的实现方式等问题的现实描述,更是对利益的客观物质性基础、私人利益与人类利益的辩证统一、革命意识对实现利

益的反作用等问题的价值阐扬。只有坚持事实评价与规范评价的统一,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道德学说的辩证批判性特质,也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和理论特质。

注释:

①参见 D. P. H. Allen, “The Utilitarianism of Marx and Engel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73, 10(3), pp. 189~192.

②E. Buchanan Allen, *Marx and Justice: The Radical Critique of Liberalism*, New Jerse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82, pp.28~29.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④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162、519、12~13页。

⑤⑩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6、9页。

⑥边沁:《道德与立法的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⑩⑫⑬⑭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479、489、479~480、第三卷说明第X页。

⑪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⑮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⑮D. P. H. Allen, “The Utilitarianism of Marx and Engel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1973, 10(3), p.192.

⑮伊安·夏皮罗:《政治的道德基础》,姚建华,宋国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1页。

⑮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54页。

⑮⑮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6、204~205、9~10页。

⑮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⑮⑮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9页。

⑮⑮沈江平:《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评判》,《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第30页。

⑮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责任编辑 戴道昆

ment and career value self-assessment, but may lead to withdrawal personality. This conclusion was verified by the analysis of GHQ-12 scale data and the reference variables. This suggests that we need more ac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are and protec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Relevant conclusions also suggest that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related to growth experience in the reserved salary decision model.

Key words: left-behind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rved salary; migrant worker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motion of Consumer Power ——Consumer Empowerment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87)

Zhou Mengke

(Center on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promotion of consumer power in the course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a production-oriented society to a consumer-oriented society has greatly enhanced the autonomy of consumers. At present, the two-way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onsumer society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social development mode and daily life styl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great changes of consumers' power have taken place. Information power is the infrastructural power of consumers while information supplies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consumer empowerment. In this situation, the main body of consumer empowerment appears to be pluralistic, including consumers' self-empowerment, market (enterprise) empowering consumers, also consumer union and consumer community empowering consumers.

Key words: production-oriented society; consumer society; mobile Internet; consumer; empowerment

Human Nature, Exploitation 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On the Criticism of Marx's Moral Theory to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94)

Gu Qingqing, Yu Longjin

(College of Marx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Allen, Buchanan and other western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basis of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and investigation of communism is the priority of benefit-oriented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result-oriented. Its core concepts and arguments belong to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this obviously deviates from the spiritual core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matter of fact, Marx examined interest and morality from concrete social practice. It realizes the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s moralit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 nature, exploitation 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To be specific, Marx replaced the abstract view of human nature with the concrete view of human nature, established the objective material basis of interests, and laid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Marx substituted "common possession" for "exploitation relationship", realized the unity of private interests and human interests, which not only defended individual rights but also guaranteed the goodness of the community. Marx replaced "reformism" 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objective laws and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was the way to realize interests, that is to say, only through institutional criticism and revolutionary practice can morality be truly realized. Through these three dimensions, Marx realized the revers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al utilitarian moral view,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ed his own moral theory of historical, social and revolutionary dialectical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arx; utilitarianism; human nature; exploitation;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Machine Learning and Creative Epistemic Labor (100)

Bai Huiren¹, Cui Zheng²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2. School of Marxism,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Abstract: The replacement of human labor by machine learning has been a topic of widespread concern amo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tists in recent years, an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boundary. Marx's distinction between repetitive labor and creative labor provides a boundary framework for machine learning to replace human labor, and creative labor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labor which could not be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ever, the ques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that machine